

第二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
暨朱元璋与明中都国际学术研讨会
论文汇编
(下册)

中国明史学会
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政府
安徽科技学院

2019年8月

鐵冠道人張中生平事蹟考略

謝忠志

鐵冠道人張中，在明史並非是廣為人知的人物，反而在武俠小說中，能見其風采。金庸（查良鏞，1924-2018）在著名武俠小說《倚天屠龍記》，是以如此方式介紹鐵冠道人的出場：

只聽說不得道：「鐵冠道兄，咱們找找韋兄去，我怕他出了甚麼亂子。」鐵冠人道：「青翼蝠王機警聰明，武功卓絕，會有甚麼亂子。」說不得道：「我總覺得有些不對。」忽聽得一個聲音從底下山谷中傳了上來，叫著：「說不得臭和尚，鐵冠老雜毛，快來幫個忙，糟糕之極了，糟糕之極了。」說不得和鐵冠道人齊聲驚道：「是周顛，他甚麼事情糟糕？」說不得又道：「他好像受了傷，怎地說話中氣如此弱？」不等鐵冠道人答話，背了張無忌便往下躍去。鐵冠道人跟在後面，忽道：「啊！周顛負著甚麼人？是韋一笑！」……只聽說不得沉著嗓子道：「小子，我跟你說，我是『布袋和尚說不得』，後面那人是鐵冠道人張中，下面說話的是周顛。我們三個，再加上冷面先生冷謙，彭瑩玉彭和尚，是明教的五散人。你知道明教嗎？」張無忌道：「知道。原來大師也是明教中人。」說不得道：「我和冷謙不大愛殺人，鐵冠道人、周顛、彭和尚他們，卻是素來殺人不眨眼的。他們倘若知道你藏在我這乾坤一氣袋中，隨隨便便的給你一下子，你就變成一團肉泥。」^①

經過六大門派圍攻明教光門頂一役後，為保全主人翁張無忌安危，說不得和尚將置入乾坤一氣袋內。透過他人言談，藉以刻畫人物形象，是文學常見的表達方式，因此金庸藉由說不得之口，帶出鐵冠道人，並將其形容為「殺人不眨眼」武功高強的人士。

前述引文，提及鐵冠道人張中歸屬「五散人」，明教裡位階甚高。明史雖未有五散人，但五個人物中，除布袋和尚說不得為杜撰之外，張中、冷謙、彭瑩玉與周顛等四人均為史實人物。不僅如此，金庸還巧妙的把韓山童（？-1351）、韓林兒（1340-1366）、朱元璋（1328-1398）與常遇春（1330-1369）等人，融入於虛構的小說裡，使得軼事難辨真假。

查察目前今人對元末至明王朝建立時間的研究，明教、紅巾軍與元末群雄等議題均有專文剖析。張中、周顛等人雖曾拜入朱元璋麾下，但事蹟並不彰顯，甚少學者深入探悉。本文探討的張中，因擅長太極數學，而被朱元璋網羅，由於成功預言陳友諒（1320-1363）敗亡逐漸受到重用，但開國後張中隱居鍾山，卻不知所蹤。宋濂（1310-1381）對此嘖嘖稱奇，遂撰寫〈張中傳〉，成為目前瞭解其生平最重要的張本。張中以道術名揚，而讓史家、小說家有著力點加以渲染，不僅將其與周顛、劉基（1311-1375）同列，且加油添醋的載記其預言藍玉（？-1393）叛變、朱棣（1360-1424）奪嫡等事件，張中因而被升格為神仙，甚至有〈蒸餅歌〉、〈鐵冠數〉等文傳世，成為後人茶餘飯後的熱門話題。因而，本文透過考察張中的生平，瞭解其事蹟在明中期後不斷累積的原因，以及分析其存在的時代意義。

二、張中的名號、事蹟與人際網絡

張中，生卒年不詳，江西臨川人。家世淵源，史籍均不錄，僅說明年少習儒，因未能如願考取進士，遂縱情於山水，遊歷江右諸郡。後遇一異人，傳授太極數學，而改變一生。雖因元末避亂而歸隱幕府山，卻也常至城市與人討論避兵良方。若從「從之者多獲全」的記載

^① 金庸，《倚天屠龍記》（臺北：遠流出版社，2005），第19回〈禍起蕭牆破金湯〉，頁735-736。

來看，能教人趨吉避凶，顯見道行已有一定能力。^①

元末時期，群雄競逐，陳友諒、張士誠（1321-1367）、方國珍（1319-1374）等人勢力強大，朱元璋在得到劉基、宋濂等人的襄助後，實力亦不容小覷。在劉基建議下，擬定「先漢後周」的戰略方針，決定先攻陳友諒勢力，^②此一決定，也成為張中崛起的關鍵。至正二十二年（1362）正月，朱元璋勢力進入江西，在鄧愈（1337-1377）等人協助下取得洪都（南昌），並統領江州、南康、建昌、撫州等地區，與陳友諒勢力持續抗衡。朱元璋十分信任鄧愈，任命為江西行省參政，並以降將祝宗、康泰為其部從。^③朱元璋正值用人之際，張中為江右人士，鄧愈因而舉薦。

「預知」是術士的重要能力，成功預言並使其防範於未然，使影響減到最低。雖有地域關係與寵臣背書，朱元璋面對「初出茅廬」的張中，仍頗有疑慮，以「賜坐」禮遇以測試能耐。由於朱元璋兵未血刃就取得南昌，十分擔憂地方安定等問題，但張中僅答：「未也，旦夕此地當流血，廬舍焚燬殆盡，鍊柱觀亦化為灰燼，惟一殿巋然存耳。」^④不久，發生康泰叛變，果應驗此說。張中也同時示警，朝中日後有人叛變，需加以提防，七月果然爆發平章邵榮（？-1362）、參政趙繼祖反叛，兩人相繼伏誅，正如張中所料。^⑤隔年五月，朱元璋前往覆舟山（九華山）祭拜山川百神，也垂詢張中此行狀況，顯見逐漸受到朱元璋器重。

張中術數「占驗奇中」，《明史》因而將其輯錄於〈方伎傳〉。^⑥然而，《明史·張中傳》的內容，多摘抄自宋濂撰寫的〈張中傳〉。宋濂〈張中傳〉內容，共分三段，篇幅僅七百餘字，前兩段講述張中從年少遭遇、初試啼聲到嶄露頭角的經過，最後一段則是宋濂以主觀角度，說明張中術數的奧妙與撰寫傳記的用意，摘錄如下：

贊曰：濂數與中游，見其人類陽狂玩世者；與之語稍涉倫理，輒亂以他言，竟莫測其故。甲辰夏五月，同列二博士，有拂上意，方杜門待罪。中叩二人所生年，捉筆作點點，狀如計數者。良久，笑曰：「不遠，復期在七月五日。」濂書而識之。至六月之晦，有旨令二人復官。頗疑其術之未盡驗，及獲見上謝，則中所期也。中之術亦異哉！上嘗親疏十事，命濂作傳藏金匱中。後六年，觀遺稟於故篋，因繕錄之，而并紀所識之事云。^⑦

宋濂與張中為舊識，皆為朱元璋侍臣，並於「甲辰年」與朱元璋共同見識張中術數的奇幻之處。甲辰年為元至正二十四年（1364），為朱元璋自立吳王後隔年。宋濂提及撰寫傳記之因，係因朱元璋所請，史事則取材於朱元璋「親疏十事」及宋濂本身見聞。宋濂〈張中傳〉因記載豐富、詳細，為日後明人寫史取材的重要藍本。雖為當代人記當代事，但史源來自朱元璋及宋濂的所見所聞，並無其他相關史載，使得張中生平事蹟的真實性有待商榷。

綜觀明代典籍，對張中的記述有兩部分值得深究：首先，在名號上，姓名除少數誤寫為張忠或傅中外，^⑧其餘一致書為「張中」。明人多對「字」有較大分歧，分成兩類：一類主張字「景華」，以宋濂〈張中傳〉為代表，《明史》、《七修類稿》、《孤樹哀談》、《筆精》與《撫州府志》等書均是相同記載；另一派則確定字「景和」，以《太祖實錄》為代表，《國朝典彙》、《靳史》、《皇明通紀法傳全錄》、《今言》和《庚己編》等書均依此載錄，且數量較記「景華」

^① 《明太祖實錄》，卷 13，癸卯歲八月壬戌條，頁 3a。

^② 清·張廷玉，鄭天挺點校，《明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），卷 128〈劉基傳〉，頁 3778。

^③ 清·張廷玉，鄭天挺點校，《明史》，卷 126〈鄧愈傳〉，頁 3749。

^④ 明·宋濂，《鑾坡前集》，卷 9〈張中傳〉，頁 658。

^⑤ 《明太祖實錄》，卷 11，壬寅歲七月丙辰條，頁 3。關於邵榮反叛的考察，可參閱李新峰，〈邵榮事跡鉤沉〉（《北大史學》第 8 輯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1），頁 76-89。

^⑥ 清·張廷玉，鄭天挺點校，《明史》，卷 299〈方伎傳〉，頁 7633。

^⑦ 明·宋濂，《鑾坡前集》（《宋濂全集》，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2014），卷 9〈張中傳〉，頁 658-659。

^⑧ 《秘閣元龜政要》誤植「張忠」，但文後寫正「張中」，至於《萬姓統譜》寫錯成「傅中」。詳見明·佚名，《秘閣元龜政要》（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史部第 13 冊，臺南：莊嚴文化，1997，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），卷 5，頁 367；以及明·凌迪知，《萬姓統譜》（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 263 冊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），卷 95，頁 382。

者多。追查二類抄錄原本，無論是宋濂〈張中傳〉或《實錄》，均具一定可信度，實難辨正孰為訛誤，或如《明人傳記資料索引》所列「張中字景華，一字景和」最為合宜。^①

在稱號上，明代前後期稱呼不一。張中因常戴鐵冠，人稱「鐵冠子」，明初多以稱呼，故《明實錄》等書多以「張鐵冠」稱，^②並未稱之「道人」。世宗以後，隨著道家思想的瀰漫，張中道術被渲染，正德、嘉靖以後的典籍，如都穆（1458-1525）在《都公譚纂》裡，就以「鐵冠道人」稱呼張中，^③爾後甚至凌駕原本姓名，世人多知鐵冠道人，而不知其名諱，^④也成為史上最為熟知的「鐵冠道人」。^⑤

其次，鄱陽湖之戰的描述略有出入。鄱陽湖之役，是張中最值得一書的人生經歷，也是張中的得意時期。因而，宋濂〈張中傳〉一篇有七百餘字，卻以二百多字描述他在朱元璋、陳友諒兩軍作戰中扮演的角色，以及如何使用術數協助朱元璋打贏勝戰的經過。簡而言之，張中的事蹟與協助朱元璋打贏鄱陽湖之戰不無關連。

根據宋濂之說，至正二十三年（1363）四月，陳友諒率大軍圍攻洪都城，卻因久攻，洪都守軍堅守近三個月，直至朱元璋馳兵襄助，並命張中隨行。張中此行甚為重要，如船隻無風不能前行，便施法祭壇以起風；常遇春孤舟深入反被敵軍包圍時，張中透過占卜要軍士寬心勿憂，質言「亥時當出」，發揮安定軍心作用。在朱元璋出兵之際，曾問張中狀況，張中回答：「五十日當大勝，亥子之日獲其首領。」從出發援助南昌，到陳友諒中流矢身亡而投降，共計五十日，再度讓朱元璋見證張中的不凡之處。

然而，本段時間恐有謬誤，可根據錢謙益（1582-1664）的考察加以論證：

又《實錄》紀辛卯之戰，廖永忠等六舟深入。而〈鐵冠子傳〉則云：「己丑，戰湖中之康郎山，常忠武王深入，虜舟數四圍之，僉以為不可救。」上曰：「勿憂也，亥時當自出。」如期果出，連戰輒大勝。偽五王陳友仁及將士溺死者無算。辛卯、己丑，相去又三日。三文皆出宋學士手筆，不知何以與國史錯互如此，更相考之。^⑥

查《太祖實錄》記載：「辛卯，復聯舟大戰，俞通海、廖永忠、張興祖、趙庸等以六舟深入，敵連大艦拒戰，我師望六舟無所見，謂已陷沒。」^⑦確為辛卯日，但宋濂卻記「己丑日」，錢謙益不解竟有如此錯誤。

《太祖實錄》為解縉（1369-1415）等人於永樂元年（1403）奉旨重修，晚出於宋濂一文，平心而論，宋濂之誤尚可體諒，肇因於宋濂撰寫〈張中傳〉的目的，在於傳播張中的奇人異聞，以及凸顯朱元璋的天命所歸。《太祖實錄》為明代最重要的官修編年體史書，除記述朱元璋的眾望所歸，更強調史事人、時、地的確切性，如宋濂文中聲稱，張中「五十日當大勝，亥、子之日獲其首領」之說，《實錄》則改為「（壬）戌、（癸）亥之日」，足見史官考史用心，並非只是傳抄、謄錄。^⑧

人際網絡是本文值得深入探研的部分。張中個性玩世不恭，為人狷介寡合，正史雖未明言其交友狀況，仍可根據相關典籍推敲，除宋濂之外，貝國器當為其摯友。貝國器生平《實錄》、《明史》均未載，僅見於《名山藏》、《石匱書》與《罪惟錄》等晚明私家修史中，查繼

^① 國家圖書館原編、王德毅增訂，《明人傳記資料索引》（臺北：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78），頁157。

^② 參見《明太祖實錄》，卷13，癸卯歲八月壬戌條，頁1a。

^③ 明·都穆撰，明·陸采編，《都公譚纂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1266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，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），卷上，頁647-468。

^④ 明·李默，《孤樹哀談》（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子部第240冊，臺南：莊嚴文化，1995，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），卷1〈太祖上之上〉，頁187：「今人類稱之，而少知其姓名者。」

^⑤ 除宋代蘇軾自號鐵冠道人外，明代另有楊維禎（1296-1370）、詹仲和（1488-1505）均以此為名號。可參閱明·徐（火勃），《筆精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97），卷7〈鐵冠〉，頁267。

^⑥ 清·錢謙益撰，張德信、韓志遠點校，《國初群雄事略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），卷4〈漢陳友諒〉，頁101。

^⑦ 《明太祖實錄》，卷12，癸卯歲七月辛卯條，頁7b。

^⑧ 《明太祖實錄》，卷13，癸卯歲八月壬戌條，頁3b；以及陳學霖，〈明太祖「龍飛」官史「塑像」之分析——《太祖實錄》史料探源舉隅〉（《明代人物與史料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，2001），頁51。

佐（1601-1676）《罪惟錄》則將貝國器的介述，附於〈張中傳〉後，足見兩人事蹟相類。大體而言，這些典籍內容相仿，根據文中提及，貝國器為溫州郭溪人，寓居海寧，以異術聞名，甚至可以縮骨藏於筍中。或以《名山藏》為例，窺見二人交友情況：

吳元年，與鐵冠道人遊白下，同宿，值高皇帝微行，假榻焉。因無枕，以斗為枕而寢。

國器夜出視天，曰：「帝星臨斗。」上遽昂首聽之。鐵冠曰：「尚離尺餘也。」上大驚。

明日召二人至，問國器以國號，對曰：「當是大明。」問鐵冠以年號，對曰：「當是洪武。」皆上心所默定者益異焉。然恐其惑眾，將殺之，俄而隱形，去不復見。^①

貝國器與張中同遊共眠，可見交情匪淺。但本則掌故在字裡行間，並無朱、張二人早已熟識的證據。張中協助朱元璋戰勝陳友諒後不久，就隱遁不問世事，若與朱元璋偶遇南京，豈有不行禮之理？再者，自至正二十二年至吳元年（至正二十七年，1367）已五年餘，君臣二人言談間不見熱絡，僅因占驗就亟欲除之而後快，不太符合常理。最後，根據黃景昉（1596-1662）的考察，此軼事可能來自「漢武帝微行故事」而稍加修飾，^②使得本則史事的真實性，以及張、貝二人交往的實際狀況仍須存疑。

亦可從文人集團思考張中的人際網絡。不少明中葉成書的典籍，曾記載朱元璋洪武元年登鍾山的事蹟，興之所致，提筆賦詩，並要求隨行官員張中與鮑尚綱、秦裕伯（1295-1373）、朱升（1299-1370）、張以寧（1301-1370）、單友中等人應制。^③這些文臣中，秦、朱、張三人學養醇厚，秦裕伯更以詩文成名，能與這批文學之士一起應制賦詩，表明張中不僅通曉術數，文才頗受肯定，也能合理推測張中曾與上述文臣交往。

何孟春（1474-1536）的《餘冬序錄》，可能是最早記錄此事蹟的史籍。何夢春從唐文鳳所作的〈鮑尚綱行狀〉摘抄此軼事。^④考察鮑、唐二人，明代典籍對鮑尚綱著墨不多，無法得知其生平；雖未有唐文鳳傳記，透過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記載，唐文鳳於永樂中時為江西興國知縣。^⑤若輔以《明史》參照，則發現值得玩味之處：如〈秦裕伯傳〉記載：「洪武元年，……與張以寧等扈從，登鍾山擁翠亭。」^⑥〈張以寧傳〉、〈秦裕伯傳〉二文內容，僅有登山之實，卻無張中之名，而〈張中傳〉亦未記載此事，張中似乎不在本次出遊的名單之列。若考慮史籍付梓時間，《餘冬序錄》早出於《明史》成書時間約在嘉靖六、七年間（1527-1578）。但清朝張廷玉（1672-1755）等人纂修正史時，並未全文援引，而有所刪節。《餘冬序錄》為明代典籍，李默（1494-1556）《孤樹哀談》亦收錄此軼事，因而本文採納何孟春所記，認為張中曾與鮑尚綱、秦裕伯與朱升等人交遊，並參與這場君臣間的文娛活動。

張中多與僧道往來，較為志同道合，因此周顛、月庭和尚二人，也可能曾與張中往來。周顛為僧侶，與張中同為江西人，在鄱陽湖之役中，二人隨侍朱元璋，與眾人群策群力、通力合作，終能克敵致勝。^⑦鄭曉（1499-1566）的著作《澹泉筆述》，也提及在洪武元年，有位月庭和尚精通天文，但與鐵冠道人議論時不合，又出語犯上，被安置在和州，爾後遭人怨

^① 明·何喬遠，張德信、商傳、王熹點校，《名山藏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0），卷103〈方外記上·貝國器〉，頁2899。

^② 明·黃景昉，《國史唯疑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432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，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徐銜抄本影印），卷1〈洪武建文〉，頁7-8。但筆者查閱《漢武事略》、《漢武故事》與《漢武洞冥記》等書，並未見得黃景昉指稱的「原型故事」，筆者查閱不周詳或此記錄未能流傳至今，實不得而知。

^③ 明·鄭曉，《今言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），〈三百一十九〉，頁179。

^④ 明·何孟春，《餘冬序錄》（臺北：傅斯年圖書館藏據明刊本影印），內篇卷25，頁2b。

^⑤ 清·永瑤等編撰，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3），卷170〈集部二十三·梧岡集八卷〉，頁3621：「文鳳字子儀，號夢鶴，歙縣人。與祖元、父桂芳俱以文學擅名。永樂中薦授興國縣知縣，改趙府紀善，卒年八十有六。」

^⑥ 清·張廷玉，鄭天挺點校，《明史》，卷285〈秦裕伯傳〉，頁7317。

^⑦ 明·郎瑛，《七修類稿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），卷9〈國事類·周張二仙〉，頁137。

謗而杖死。^①然而這些軼事，恐怕與史無據，卻仍被典籍蒐羅其中。鄭曉淹通羣籍，留心國朝典章，^②卻難免仍有未察之處，遑論其餘。

三、溫故知新的「鐵冠道人」

明代早期的內外朝野，對早先群雄割據、繼承大統與建國取號等議題，多噤聲不提。直到正德、嘉靖以後，中央控制力薄弱，法網漸疎，加上當時文士樂於記錄、考究史事，使得私人記事著史的盛況空前。士庶喜談人物軼事，也熱中拼湊歷史的原貌，當然道聽塗說不加考證的敘事方法亦不在少數。張中因富有神通能力，增添人們的新聞話題與想像空間，成為大家樂此不疲的討論人物之一。

隨著史學發達，史家試圖補足宋濂〈張中傳〉未盡之處，其中以陸燾（1494-1551）《庚己編》最具代表。《庚己編》顧名思義，撰寫於庚午至己卯十年間（正德五年至十四年，1510-1519），為陸燾年輕時未中進士前的力作，^③成為自宋濂後記述張中的首位文士。陸燾的〈鐵冠道人〉與宋濂〈張中傳〉大相徑庭，內容多前代未曾聽聞，可謂全新的文學作品，成為日後文史學家傳抄的原本。

正德之後的文史學家，主要針對張中究竟從何而來、往哪裡去以及預言事件等三部分較感興趣，因而加以填補。本段將歸納所有討論文本內容，整彙出三個不同與明初典籍記載之別：

（一）相遇時間為至正十三至十四年

本部分敘述強調張中與朱元璋的相遇，以及張中透過相術，告知朱元璋的不凡之處。明代中後期的史家，認為張中早在至正十三年（1353），朱元璋「初駐滁陽」時，就透過武將引薦而相識。當時朱元璋仍為郭子興（1302-1355）部將，於該年取得滁州，是朱元璋的第一個據點，因威名日著，而有張中求見，並極言：「明公龍瞳鳳目，狀貌非常，貴不可言。若神采煥發，如風掃陰翳，即受命之日也。」^④《皇明啟運錄》雖未有二人相識地點、如何相識原因，卻記錄二人相識時間為至正十四年（1354）十月。^⑤也就是時間提早八至九年，把地點從江西改為安徽，並省去舉薦人鄧愈之名。陳建（1497-1567）在《皇明啟運錄》裡，更具體言明張中預言「受命應在千日內」，而受到朱元璋的重用。部分野史甚至指稱，朱元璋定都南京後，許多的勘查、規劃多出於張中建議。

（二）預言藍玉案、靖難之役

洪武二十六年（1393），朱元璋以藍玉謀反的罪名，趁機誅殺開國功臣，為明初三大案。即使今日都無法釐清藍玉罪狀，但當時仍熱中討論這類禁忌話題。此時文人則用二人相見的逸聞，隱喻藍玉性格驕矜而不知大禍臨頭：

梁國公藍玉一日乘間訪之，道人野服出迎，玉戲之曰：「腳穿芒屨迎人，足下無履。」時玉以椰子瓢飲，道人荅云：「手執椰杯勸酒，尊前不鍾。」蓋密寓譏諷之意。玉武臣，勿悟，相與一咲而散。不久玉果被禍，而道人之言始驗。^⑥

藍玉案是當時的熱門話題，因而許多典籍加以記載、討論，如成書略早於《庚己編》的《客座新聞》，作者沈周（1427-1509）收錄一則〈術士胡日星禍驗〉，是則胡日星預測自己與藍玉同日被殺的事件。此條雖經王世貞（1526-1590）考證，與藍玉被誅的時間不符，但因此

^① 明·鄭曉，《澹泉筆述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1171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，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），卷7，頁232。

^② 明·鄭仲夔，《玉塵新譚》（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子部第38冊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0，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刻本影印），清言卷3〈文學下〉，頁31。

^③ 李解民等人曾對《庚己編》書名、成書時間詳加考察，可參考李解民，〈從《庚己編》書名之訛說起〉，《中國典籍與文化》，2005年第3期，頁101-102。

^④ 明·陸燾，《庚己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），卷7〈鐵冠道人〉，頁75。

^⑤ 明·陳建，錢茂偉點校，《皇明啟運錄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），卷1，頁14。

^⑥ 明·都穆，《都公譚纂》，卷上，頁647-648。

議題人物有討論熱度，同時具有警世作用，避免臣民僭越逾分，穩固朱明王朝統治。

至於當時明人最津津樂道的另一議題，則是「靖難之役」，也藉由張中的事蹟帶動討論風氣。如徐學聚在《國朝典彙》提及，張中曾對洪武後期時局加以預言，其中幾句說道：「戊寅閏五龍歸海，壬午青蛇火裏逃。」^①戊寅年是洪武三十一年（1398），為朱元璋駕崩之年，壬午年則為建文四年（1402），也就是惠帝在位最後一年。詞句呼應惠帝亡於宮中火起之說，文中卻以「逃」字，表明事有蹊蹺，生死似乎是未定之天，頗引人遐思。

亦有史家巧妙地將這段史實填補於張中的生平事蹟之中，如相傳惠帝起兵時，曾有道士於在路途喃喃自唱：「莫逐燕，逐燕日高飛，高飛上帝畿。」^②因而清康熙年間編纂的《江西通志》，就補入「建文時在金陵復見張中」的傳聞，^③指稱此名道士就是張中，更增添人們的想像，對張中的道術更加崇敬。

（三）大中橋為投水地點

朱元璋對待功臣嚴酷，張中如何全身而退，頗令明人好奇。當時的掌故記錄，也試圖對張中生平作一結尾。因此，描述張中最後無故自大中橋投水而死，未尋獲遺體。不久，潼關守官卻奏稱，曾目睹某日鐵冠道人策杖出關，時間恰為投水之日。^④文人選擇「大中橋」作為張中的告別場域，頗富代表意義：大中橋是南京重要津橋，商賈、旅人往來頻繁，恰可為歷史事蹟的見證人、傳播者；另外，它是仙術的展示場所，如南都人熟知的「尹蓬頭」，亦曾在此被人看出不凡之處。^⑤張中自我了斷告別朱元璋，符合自身「仙道」風格，也讓一生更添神秘色彩。

張中傳記的流行，與當時流行私家著史、撰寫人物傳記有很大的關連。本文所談的「私史」，是包含著重視考訂史實的野史與重視記錄敘事的稗乘、雜記，也就是在《四庫全書》分類中，被歸屬為「史部雜史」、「子部雜家」、「子部小說家」等類的書籍。明代中期，史書對張中較完整的描述，是在被王世貞（1526-1590）評為「好怪而多誕」的《庚己編》裡，^⑥但卻也被蒐羅在《靳史》、《國朝典彙》等史書中，而這些方士、異術，都是當時朝野樂於談論的話題。

官史的缺漏，提供野史掌握詮釋權的機會。靖難後得位的朱棣，並不修纂建文實錄，造成明代史學發展的空窗，部分內容甚至與史實不符，因此「補闕」成為此時期史學發展的重要目的之一。^⑦不僅如此，清初出版的《鐵冠圖全書》，該書雖以「鐵冠」為名，卻以諧音暗喻人物，把鐵冠道人改名為「張冲」，字也被更為「子華」。該書以鐵冠道人為朱元璋作圖占卜國祚為楔子，主要敘述闖王李自成（1606-1645）的崛起與殞落，終則明亡清興，使得鐵冠道人的占驗成真。^⑧《鐵冠圖全書》不以張中為主角，但卻藉由張中的預言、占驗，形塑張中預知生死、洞悉古今的仙人形象，因而不少明人將其與周顛、張三丰同歸於仙道一門；^⑨其料事如神預言家的能力，經由小說家渲染後，具仙風道骨，更顯得高深莫測，在民間逐漸受到矚目，甚至可與劉基同列，成為另一位明代「神機妙算」的代表人物。

^① 明·徐學聚，《國朝典彙》（北京：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96），卷136〈禮部·異術〉，頁1707。

^② 明·鄧士龍輯，許大齡、王天有主點校，《國朝典故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3），卷14〈奉天靖難記四〉，頁276。

^③ 《（康熙）江西通志》於「按」表示，此歌謠未載於《明書》，故從《豫章書》所載。但今時已不復見郭子章（1543-1618）的《豫章書》，但在《國朝典故》中有相同記載。可參閱清·謝旻，《（康熙）江西通志》（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516冊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），卷104〈撫州府〉，頁450。

^④ 明·陸粲，《庚己編》，卷7〈鐵冠道人〉，頁75。

^⑤ 可參見明·陸容，《客座贅語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），卷8〈尹山人〉，頁259-261。

^⑥ 明·王世貞，《弇山堂別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），卷20〈史乘考誤一〉，頁361。

^⑦ 關於明中後期建文史籍的編撰，可參見楊豔秋，《明代史學探研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5），頁216-232。

^⑧ 清·松滋山人，《鐵冠圖全傳》（北京：春風文藝出版社，1998），頁581-583。

^⑨ 可參考明·王鏊，《震澤長語》（《筆記小說大觀》第4編第5冊，臺北：新興書局，1978），卷下〈仙釋〉，頁27a：「若神仙者，謂之有，則平生未之見；謂之無，則古今所傳奇踪異跡不可勝紀。國初周顛仙、張鐵冠、張三丰，灼灼在人耳目。」

四、結論

金庸小說中，鐵冠道人受矚目的程度，遜於同列「五散人」的說不得、冷謙等人，但在明史卻是確切存在的人物。張中因進士不第，縱情於山水，奇遇異人傳授術數，自此改變一生，拜入朱元璋帳下，成為協助擊敗陳友諒的重要謀士，是人生的顛峰時期，但不久後便辭官隱世，不知所蹤。宋濂身為張中友人，提筆撰寫〈張中傳〉，將其事蹟流傳後世。

儘管有宋濂〈張中傳〉、《太祖實錄》與《明史·張中傳》等官方史書記載張中事蹟，但內容不盡相同，如在名字上有景華、景和之別，別號則有鐵冠子、鐵冠道人之差，說法莫衷一是。而在鄱陽湖之役中，宋濂〈張中傳〉所記述的時間與史實不符，《太祖實錄》、錢謙益均以加以考究其訛誤。然而，宋濂著述的目的著重記事，記錄「占驗奇中」的異人張中，敘述曾經協助朱元璋的謀臣張中，考證史實並非要務。

迄至正德以後，政治控制力薄弱，文士有心於著述，關懷奇人軼聞，因而張中的事蹟再被搬上檯面。文史學者試圖重建張中人生，在生平上，將朱元璋、張中相遇時間，從至正二十四年提早到至正十三、十四年間，並將「大中橋投水」作為人生謝幕，充滿傳奇色彩。此外，為強化預知能力，將藍玉案、靖難之役適時的點綴到人生事蹟之中，強化人物形象。清初的《鐵冠圖全書》更是將張中形象推至高峰，張中驟變為洞燭機先的高人。大體來說，張中在明代的形象，則是朝著方士、謀臣、仙人的身分逐漸轉變。

明朝的歷代典籍，試圖塑造一個「通天文、曉曆數」的鐵冠道人。但本文藉由《餘冬序錄》的記載，看到一則曾經被淹沒的歷史事實：一個與明太祖及其詞臣同登鍾山應制賦詩的張中，一個原本習儒應舉，因落第而投身術數的張中，卻在君臣同歡的文娛活動中，展現不同於方士身分的風采。

透過張中，我們藉由明代書寫的發展歷程，可以看到明太祖對術士的仰賴，也可窺見明中期知識分子對於書寫歷史、傳播新聞的渴望。儘管為數不少的典籍，內容記載多為荒誕不經的奇聞異事，卻也保留當時的社會現象，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，我們能藉此瞭解正德以後道家思想的流行，以及史學的蓬勃發展。本文透過明代各時期對張中書寫和傳抄，其實也投射出士民對當時社會的渴望，這也是在眾多明代人物中較為少見的。